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胡厚宣 著

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胡厚宣 著

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胡厚宣著.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5.12

(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

ISBN 7-222-04625-9

I. 古... II. 胡... III. 史學—研究—中國

IV. K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154924 號

責任編輯 王小燕 陳 遲
特邀編輯 郭永秉 傅 傑
裝幀設計 楊曉東
責任校對 海 雲
責任印制 洪中麗

書 名	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
作 者	胡厚宣 著
出 版	雲南人民出版社
發 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 編	650034
網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 public.km.yn.cn
開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張	4.25
字 數	111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4000 冊
排 版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公司
印 刷	雲南新華印刷一廠
書 號	ISBN 7-222-04625-9
定 價	20.00 元

尊敬的讀者: 若你購買的我社圖書存在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系調換。

發行部電話: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郵購)

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重刊弁言

傅 傑

胡厚宣先生（一九一——一九九五）是著名的甲骨學與殷商史專家，一生勤耕不輟，在甲骨學與殷商史研究領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著有甲骨學商史論叢、殷墟發掘、五十年甲骨發現的總結、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等，編錄有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集、戰後京津所見甲骨集、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等，並主持編纂了甲骨文合集，被國際學術界譽為甲骨學研究第一人。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是胡先生篇幅最小，但卻具有特殊意義的一部著作，因為這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寫就（胡先生在書末標示：『一九四九年除夕寫完正文，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增加附注訖』），一九五〇年六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書，堪稱是建國以後第一部討論學術規範問題的專著。

學術規範作為一個牽動衆多學者關注的公共學術話題，討論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但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的，中國古代即不缺少學術規範的傳統。而上個世紀的上半葉，一些學者雖然未立學術規範之名，然而在論著中對學術風氣與學術著作的批評，其實都表達了很明確的『規範』意識。顯著的例子如三十年代，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即針對時人的不良學風，為古文

字研究設立了六條戒律：一戒硬充內行，二戒廢棄根本，三戒任意猜測，四戒苟且浮躁，五戒偏守固執，六戒駁雜糾纏，並逐條作了詳細的說明。至胡先生本書，則所論更爲系統而深入。全書共十二章：一、三十年來中國的新史學，二、新史學的新時代，三、史料和史觀，四、典籍史料的真偽和年代，五、考古史料的徵引和解說，六、甲骨文不同的解釋，七、甲骨文錯誤的學說，八、甲骨文被揚棄了的論斷，九、甲骨文成語和單字的研究，十、粗心的援引，十一、非法的推論，十二、不要太忽略了材料的問題。

胡先生首先對三十年來的中國史學作了回顧，分階段概述了疑古、考古、釋古三大潮流的發展，指出釋古學固然是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大潮流，但疑古學和考古學關於史料的鑒定和開發，也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說疑古考古並非史學的最終目的，可以。說史學的探討，可以不經過疑古考古的基礎和訓練，或者不需要使用疑古考古的成就和方法，那就錯了。』胡先生預言，在史觀方面我們因爲進入了新的時代，必將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不過，有一種偏向，必須避免，那就是過度的忽略了材料的問題』：

史料與史觀是史學的兩個方面，並不是對立的兩種學說。史料與史觀，必須共同相輔，才能成爲史學。史料與史觀，是一件東西的兩種成分，任何一種是不能脫離了另外一種而獨立了的。

史學若是房屋，那麼，史觀是工程師，史料是木材磚瓦。只有工程師而沒有木材磚瓦，和只有木材磚瓦而沒有工程師，是同樣蓋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確的史觀，沒有正確的史料，和只有正確

的史料，沒有正確的史觀，是同樣寫不出正確的歷史來的。

典籍史料的真僞和年代章批評解放後出版的古史著作，或還在大量引用古文尚書以論證商代的歷史；或從古代類書中『雜抄一些魏晉時代的方士讖緯、神話小說，以考證商、周及其以前的歷史』；或『根據明、清一統志，以考證古代的民族地理，這都是不可以的事情』。考古史料的徵引和解說章告誡當時考古材料『發現的非常零碎，所以學說也特別複雜；材料一天一天不斷的出土，學說也就一天一天不斷的改正』。所以引證考古材料，一不能拘執舊說，二不可發揮過度。他特別表彰文中先生在中國史前人類生活之狀況中的謹慎：『因吾人所知之事實有限，故其解說，自不能過多；且推想亦不可過於理想，更不能想入非非，尤不可無中生有。』推許為真正科學家的態度。略微了解古史研究現狀的朋友不難看出，這些意見在今天都並不過時。

而胡先生批評的主要對象，則是『解放後所出唯一的一大部古史著作』——這就是吳澤教授的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除了該書有十餘處，都把作中國史綱的張蔭麟寫作楊蔭麟、把作殷代的羌與蜀的董作賓錯成商承祚之類的粗疏，主要涉及甲骨文的引證和解釋問題。胡先生直言：

目前關於古代史尤其是商代史的研究，主要的都根據甲骨文文字，這是我們近代學者僥幸勝過前人的地方，也是古代史學所以特別發達和進步的緣故。但引用甲骨文，必須具備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我們必先懂得甲骨文，我們必先認識一些字，至少關於甲骨文的一些常識，我們必須曉得。甲骨文是近五十年來新興的一種科學，材料一天一天的不斷出土，論著一天一天的不斷增

加，往往一個學說成立不久，就被新的材料和學說推翻。十六七萬片的甲骨，如不能全面探尋；近千種的論著，如不曉得其中發明揚棄、新陳代謝的踪跡，則每每不會得到正確的結論。現在通行的一些古史著作中，我們覺得有的並沒有具備這一個最低限度的基礎，有的真是連甲骨文的一些常識都不夠，東抄西抄，雜亂拼湊，結果就陷於『以不狂爲狂，以狂爲不狂』，荒謬錯誤，矛盾抵觸，而不能自圓其說。

例如，在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中有一節殷鬼、殷土、殷呂、殷苦與殷人戰爭，稱殷代和其他方國之間，除了跟鬼方的戰爭，『西土北土的呂方、苦方、土方亦不時入侵，引起幾次大戰爭』。而實際上，甲骨文中的同一個字，郭沫若曾釋爲『呂』，葉玉森則釋爲『苦』，吳氏不察，在一書中時而稱呂方，時而稱苦方，還多次把呂方、苦方並列。『同一個字，同一個方國，有時同是一片卜辭，因爲亂抄別人的引證，自己不能分別，就把它認成是兩個字或三個字，兩個方國或三個方國，以至在標題中都說起「殷呂、殷苦與殷人戰爭」、「殷呂、殷苦戰爭」，這就成了笑話了』。像這樣本身矛盾不可通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由於吳氏甲骨學的素養太差，因而對錯誤的解釋也每每只能不辨是非，輾轉抄錄，將錯就錯。如該書中有一段煞有介事的將帝辛與古羅馬皇帝尼羅（今通譯爲尼祿）所作的中西比較：

尼羅皇帝最喜歡令奴隸和奴隸、奴隸和獅虎等猛獸格鬥，欣賞被打敗的奴隸的慘狀，欣賞奴隸被猛獸傷害將死時輾轉掙扎的慘狀，這種殘酷無人道的享樂，可說是絕滅人性的暴行。中國的

殷代末代皇帝帝辛也作臺以觀奴隸互相毆鬥，甲骨卜辭有云『貞臣在鬥』，當即是奴隸角鬥之事。並且卜辭『鬥』字像二人徒手相搏之狀，葉玉森氏說，『鬥』字像怒髮徒手相搏。誰在鬥呢？『臣在鬥』，臣是奴，奴在鬥也。

胡先生指出，『鬥』字只是地名，原卜辭還有缺文，釋者不察而生誤說，吳氏則據之進一步『作了演義式的描寫』，只能當作小說家言了。除了甲骨文字的引用問題，在古代史中還有一個常被使用的方法，就是根據甲骨文中有一些什麼字，來推斷商代應該是一個什麼社會，例如甲骨文有奴字，所以商代應該是奴隸社會；甲骨文有漁字，所以商代應該是漁獵社會；甲骨文有焚字，所以商代農業應該還很幼稚，商朝人還在使用着燒田的耕作法。胡先生批判說，這種方法在根本上是大成問題的：

奴字焚字在周代的金文和漢代的說文解字中，也是有的，你能說周代漢代也是奴隸社會和使有着原始的燒田耕作法麼？隋唐的廣韻、宋代的集韻以及清朝的康熙字典、現在的字典字匯，也都有奴字焚字，你能說隋、唐、宋代、清朝和現代還是奴隸社會和原始燒田耕作法的農業社會麼？甲骨文字，在今日發現的材料中，是時代最早的中國文字。但若以甲骨文就是中國的原始文字，說中國的文字，發生創造於商朝，那就錯了。商代文化之高，甲骨文字之進步，今日學者多能言之。以甲骨文中象形字的固定化行款化，和形聲字假借字數量的繁多，就可以證明甲骨文決不是原始的文字。關於甲骨文以前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有人說至少也在千年以上，有人說至少也在夏以前。倘以造字時的社會背景，來說明商朝的社會，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胡先生進一步指出，更何況有些字的釋讀原本就靠不住，如其所說的『奴』字根本就不是一個奴隸的奴字；而甲骨文固然屢見『焚』字，但焚是商朝人打獵的一種方法，有完整的田獵卜辭可證，說文解字釋焚爲『燒田也』，燒田的意思是燒宿草以田獵，也不是種田，完全不能據此推斷商朝人是使用燒田耕作法的。

中國歷代大系古代史是逾四十萬言的大著，胡先生所指出的問題只可能是舉例，因此每每感嘆：『諸如此類的例子，是舉不勝舉。』在全書之末，胡先生再次強調：『總之，研究中國古代史，關於材料的引用，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只有史料，沒有正確的史觀，那只是些瑣碎的竹頭木屑，不能成爲歷史。只有史觀，沒有正確的史料，那只是沒有根據的一種空想，也不能成其爲歷史科學。』這實在是老生常談，對此吳氏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序言闡發得更振振有詞：

史料引用得不够，史事把握得少，寫著立論，不免囿於原則抽象，理論空泛，不踏實際，這是過去新史法之弊；而專注於史事的零星鑽鑿，拘泥於字句的繁瑣考據，把社會歷史的全面貌、全形勢以及發展體系忽視了，不把歷史當作科學研究，這是傳統史法的大弊。兩個偏頗，各是各非。其實，歷史本身就是科學，史料史事，原本並非雜亂的堆積，而是科學的紀實。應用史料、考察史事時，必須用唯物史觀來嚴謹措理，決不能再是止於注解箋釋等繁瑣的考據。如果好好的用唯物史觀來整理史料、史事，從具體史料、史事本身的科學法則，就可體現出整體的社會歷史真面貌，從而社會歷史發展理論範式，自可見到。

陳意甚高，只是知易行難、行不逮言了。胡著付梓三年後，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出版了修訂本，胡先生指出的各種硬傷，有的作了改動，如不再把『呂方』、『苦方』並列，而是只存其一；關於帝辛也和尼羅一樣觀賞奴隸格鬥的演義，則被改成了『中國的殷代末代皇帝帝辛，曾否也作臺以觀奴隸互相格鬥？史文無徵，但他確作了不少異想天開、比觀奴隸角鬥或奴隸和猛獸角鬥更慘無人道的暴行』。有的改而未盡，還留下了痕跡，如初版把董作賓的論文算在商承祚的名下，經胡先生糾正，現在我們看到其書第五章注廿九已正確地標出了『董作賓的殷代的羌與蜀』，而注三十卻一仍舊貫，稱『引文均引自前揭商著』——全不悟『前揭』已只有董著而不再有所謂『商著』了。至於改動的起因與根據，則無任何說明。

近二十年前，我跟胡先生言及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胡先生笑道：『那時我年輕啊，要是現在我就不寫這個書了。』我揣測胡先生的意思，大概是如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這樣的著作，未必值得專門寫一本書來批評吧。但本書出版後很快受到有識的同行重視，著名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中就特別加以推薦：

此書雖系小冊子，着墨不多，但對研究古史應注意的問題，以及近人治甲骨學的弊病，都簡括地指出來了，識議甚通，可供初學者參考。

盡管今天看來，書中有的論斷已隨甲骨學研究的深入而過時；行文中也不免偶有疏失，如述『先秦諸子』曾辨過某些古史傳說不足憑信時列入了淮南子，又稱廣韻為『隋唐的廣韻』等，但其良苦用心

與基本價值，都並未因歲月的更替而減損，是以張先生在一九七九年將舊著刪繁補闕、修訂更名為中國古代史籍舉要時，仍保留了本書及其提要。距初版到現在，時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如今本書已經很少見人提起，倒是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則在前兩年被編入多卷本吳澤文集的第一卷重新行世，作者在代序我的治學歷程中只自我肯定了他的大著『對殷代的社會經濟、國家組織、政治形態和文化藝術諸方面，都作了具體而微的討論』，卻與當年的『修訂本』一樣，仍無一字自劾史料的疏失或齒及所受的批評。而胡先生的這部書實在是不應該被遺忘的，因為這是建國以後第一部討論學術規範問題的專著，無論是對幫助我們了解既往的學術史，還是對幫助我們今天確立學術規範，顯然都還沒有失去現實的意義。

目錄

一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史學	一
二	新史學的新時代	五
三	史料和史觀	六
四	典籍史料的真偽和年代	八
五	考古史料的徵引和解說	一四
六	甲骨文不同的解釋	二三
七	甲骨文錯誤的學說	三〇
八	甲骨文被揚棄了的論斷	三七
九	甲骨文成語和單字的研究	四〇
十	粗心的援引	四三
十一	非法的推論	四六
十二	不要太忽略了材料的問題	四九
附註		五二

附錄

關於商周史學習問題	六八
甲骨文和金文	七八
我和甲骨文	一〇七

一 三十年來中國的新史學

中國的文化革命，發生在最近三十年，大略可以分作五個時期。第一，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是五四運動時期。第二，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是革命北伐時期。第三，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人民革命時期。第四，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戰爭時期。(一)第五，從一九四五年到現在的一九四九年，是解放戰爭時期。從一九五〇年以後，解放事業完成，就應當走上新的文化建設的大路了。

中國的新史學，如所謂疑古，考古，釋古三大潮流，也是最近三十年的事。(二)疑古考古偏重史料。疑古是舊史料的鑒定，考古是新史料的開發。釋古偏重史觀，旨在應用馬列主義的經濟觀點，以說明歷史發展的意義。其中尤以最後釋古一系，是歷史學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來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三)

三十年來，以唯物史觀作中國社會經濟歷史的探討，所謂釋古之學，可以分爲六個階段。

第一是草創的階段。因爲時代文化的啓發，首先應用經濟史觀作中國史的嘗試研究。這可以新潮雜誌上李守常的物質變動與精神變動一文，與建設雜誌上胡漢民的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孟子與社會主義，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諸文，(四)和他同胡適，廖仲愷，朱執信，季融五，呂思勉等討

論井田制度的許多文章〔五〕作代表。

第二是概說的階段。採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的社會經濟，作一通論式的史的分析。這可以陶希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之回顧與展望，周谷城的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熊得山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吳貫因的中國經濟史眼以及散見於新生命，雙十，前進，讀者，先導，革命評論，理論與批判等刊物上梅思平，梁園東，朱伯康，公孫愈之，朱鏡我，王學文，吳黎平等的文章作代表。

第三是研究的階段。由通論概說，進而作一較深的探討。可以引作代表的，有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嚴靈峯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任曙的中國經濟研究和馬札亞爾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尤以郭氏之書，在學術界曾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第四是論戰的階段。由於各家通論說法之不同，研究結果之或異，就產生了一個熱鬧的論戰階段。先有新思潮派和動力派的對壘。後有讀書雜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四個特輯。其他散見於文化雜誌，文化批判，綜合雜誌，現代史學，二十世紀，社會科學，歷史科學等刊物上的文章，也有很多。戰興最濃的脚色，先有朱其華和嚴靈峯，後有李季和王宜昌。他如王禮錫，胡秋原，杜畏之，陳邦國，孫倬章，劉鏡園，王伯平，王亞南，張橫，戴行軺，周紹濤，劉夢雲，劉蘇華，劉興唐，王興瑞，丁迪豪，任曙等，也都是常顯身手的英勇戰士。

第五是搜討的階段。經過一場熱烈的論戰之後，大家多感覺『空洞的爭辯，反而得不到正確的

結果，『豐富的材料，纔是犀利的戰具，』現在誰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六』於是偃旗息鼓，返回頭來，從新再作史料的搜集與研究。代表這一種風氣的，在南方有中國經濟，出了兩大本中國經濟史專號，號召說『一分見解，一分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見解。』〔七〕在北方有食貨半月刊，『創刊的任務，主要偏重史料之蒐集。』編者說：『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緻，甚至於不能產生。』〔八〕此外主要的學者，像郭沫若，自從發表了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後，就專在甲骨金文方面作研究。先後作有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卜辭通纂，殷契粹編，兩周金文辭大系，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金文叢考，金文餘釋之餘，古代銘刻彙考正續編等書。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和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也是儘量利用舊籍和地下的豐富材料，來作的研究。〔九〕

第六是沉寂的階段。自從一九三七年，發生了抗日民族戰爭，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後，隨着又發生了人民解放戰爭。前後十四年的時光，被這偉大的兩大革命戰爭佔去了。蓬蓬勃勃方興未艾的中國新史學，遂不能不暫時成了寧靜的狀態。

在這長長的十四年中，不像從前那樣活躍了，慢慢的僅有一些整理的研究，主要的像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今昔蒲劍，屈原研究；翦伯贊的中國史綱，中國史論集，歷史哲學綱要；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中國原始社會史，中國社會史綱，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

史，中國古代社會史，中國古代學說思想史，中國近代學說思想史，中國思想通史；吳澤的中國原始社會史，中國社會簡史，中國歷史簡編，古代史；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周谷城的中國通史；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朱伯康的中國經濟史綱；余精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和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以及此外散見在各雜誌上的論文。

這長長的十四年，如果不是戰爭，那，中國新史學的進步，一定決不止此。在努力搜討研究之後，一定會有更燦爛的果實。